

馬一浮全集

第一冊（上）

語錄

吳光主編

浙江省文史研究館

浙江古籍出版社

馬一浮全集

(全六冊)

第一冊
語錄(上)



邵鴻烈 執行主編

虞萬里

徐儒



YZLI0890169658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馬一浮全集 / 馬一浮著; 吳光主編.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80715-878-3

I. ①馬… II. ①馬… ②吳… III. ①國學—文集
IV. ①Z126. 2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88728 號

馬一浮全集

吳光 主編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 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況正兵 劉 蔚 俞駕征
封面題字 沈定庵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徐曉玲 胡亦瀟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術有限公司
開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張 151.125 插頁 6
字 數 326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715-878-3
定 價 780.00 圓(全六冊)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ISBN 978-7-80715-878-3



9 787807 158783 >

馬一浮全集編校說明

吳 光

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字耕餘。成年後取《莊子·刻意篇》“其生若浮,其死若休”義,改名浮,字一佛。後又取《楞嚴經》“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義,改字一浮,號湛翁,遂以字行。中年以後,又取《法華經》“蠲除戲論”義,名其居曰“蠲戲齋”,別號蠲叟、蠲戲老人。他還曾用過被褐、太淵、茂林武君、聖湖居士、宛委山民、雲門樵者、濠叟、夕可老人等多個字號。學者稱馬一浮先生。祖籍浙江會稽長塘鄉(今屬紹興上虞市),一八八三年四月二日(清光緒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四川成都西府街。六歲隨父返浙,居住長塘鄉後莊村讀書識字。青年時期,曾遊學上海、美國、日本,遂通英、法、德、日多國文字。回國後蟄居杭州佛寺,潛心讀書,廣閱文瀾閣《四庫全書》,從而爲他成爲“一代儒宗”打下了堅實基礎。抗日戰爭時期,馬一浮在江西泰和、廣西宜山爲浙大學子講論國學,在四川樂山烏尤寺創辦復性書院,講學刻經。新中國建立後,又長期擔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長(1953—1967),爲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嘔心瀝血,成就了一位國學大師暨現代新儒家的學問與聲名。同時大儒梁漱溟盛讚馬一浮爲“千年國粹,一代儒宗”,周恩來總理則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一起登門拜訪馬先生,並譽其爲“當代理學大師”,可見馬一浮先生在現代中國是一位學識淵博、廣受尊敬的學者。但很不幸的是,一九六六年中國爆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後,馬一浮先生被當作“反

動學術權威”被抄家焚書乃至趕出家門，遂於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在貧病孤獨中與世長辭。至一九八〇年，馬先生逝世十三周年時，才由浙江省文史館主持補開了追悼會。此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舉行了馬一浮先生逝世紀念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由安徽美術出版社編輯出版了第一本《馬一浮書法選》，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編輯出版了《馬一浮集》三卷本，由臺灣廣文書局出版了《馬一浮先生遺稿初編》《續編》和《三編》等書籍。馬一浮的著作與書法成就遂漸爲人知。但惜其蒐羅不全，傳播未廣。

二〇〇七年初，浙江省文史研究館的領導採納本人建議，決定在舊版《馬一浮集》的基礎上進一步搜集資料、組織學者編纂《馬一浮全集》。編纂計劃得到了浙江省政府領導的大力支持，由省政府下撥了專項經費。於是組成了以參事室主任方泉堯爲主任、文史館專職副館長魏新民爲常務副主任、本人忝任主編的“《馬一浮全集》編纂委員會”。編委會邀請了王翼奇、邵鴻烈、董平、徐儒宗、朱曉鵬、尚佐文、鄧新文等十多名學者參與其事，歷經五年，終於完成了《馬一浮全集》六冊的編校任務。

本書的編輯原則，按馬一浮著作性質分爲語錄、文集、詩集、雜著、輯佚五大類，編爲五冊，並搜輯評論馬一浮生平、著述與思想成就的論著編爲“附錄”一冊，合爲六冊。篇幅較大則適當分爲上下分冊。第一冊爲“語錄”專冊，收錄了《泰和宜山會語》《復性書院講錄》《爾雅臺答問》《爾雅臺答問續編》《講孝經大義序說》《語錄類編》《問學私記》九種，凡十八卷。第二冊爲“文集”專冊，收錄其平生所作“序·啟·跋”三卷、“記·傳·銘·贊”四卷、“書札”三卷，凡十卷。第三冊爲“詩

收錄其詩、詞、散曲、聯對凡十一卷，計：《蠲戲齋詩前集》二卷、《避寇集》一卷、《蠲戲齋詩編年集》一卷、《蠲戲齋詩輯佚》二卷、《蠲戲齋佚詩續輯》一卷、《芳杜詞賸》一卷、《芳杜詞外》一卷、《詞輯佚》一卷、《散曲·聯對》一卷。第四冊爲“雜著”專冊，收錄《濠上雜著》《蠲戲齋雜著》《法數鉤玄》《爾雅臺答問之餘》《試卷評語》《代筆公函》《譯著》等十種，凡十六卷。第五冊爲“輯佚”專冊，主要收錄了以往從未刊行的馬一浮手抄彙輯《越緯》《馬紀》《馬氏藝略》《馬氏遺文》《馬家詩傳》《馬藏》《馬氏稽靈淵》等遺文佚作十一卷以及佚文補遺一卷，同時收錄了浙古本《馬一浮集》和臺灣廣文版《馬一浮先生遺稿》中已刊馬一浮著《一佛之北米居留記》《香嚴閣日譜》《療養日記》三種與王培德記錄的《復性書院日記》一種，總計十六卷，姑統稱“輯佚”。第六冊爲“附錄”專冊，分爲“年譜傳記”、“生平憶述”、“思想研究”三個欄目，凡十一卷。“年譜傳記”欄收錄了丁敬涵編著的《馬一浮先生年譜簡編》三卷、《馬一浮先生交往錄》二卷和吳光編著的《馬一浮先生小傳》一卷，“生平憶述”欄目收錄了馬一浮先生的生前友好（如熊十力、葉聖陶、豐子愷、程千帆）、弟子、後學（王煥鑣、蔡吉堂、樓達人等）、親戚晚輩（如馬鏡泉、丁敬涵）撰寫的評論、憶述或訪談錄，凡二卷十七篇；“思想研究”欄目則輯錄知名學者徐復觀、任繼愈、湯一介、劉夢溪、朱維錚、戴璉璋、龔鵬程、成中英、樓宇烈先生等研究馬一浮學術思想的論文，凡三卷二十六篇。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我們這次整理點校《馬一浮全集》，是在浙江古籍出版社與浙江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的虞萬里、丁敬涵、馬鏡泉、樓達人等校點的《馬一浮集》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版本的基礎上重新編輯校點的，在遺著分類、分卷方面作了較

大的改進，收集的馬氏遺著較前集增加了約三十萬字，並增補了五十餘萬字的附錄。我們在採用《馬一浮集》為校點底本時也充分尊重了原本點校者的著作權，獲得了他們的同意與支持。第二，除底本外，我們採用的參校本有臺灣廣文書局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版《馬一浮先生遺稿初編》和同社一九九八年二月版《馬一浮先生遺稿續編》、二〇〇二年二月版《馬一浮先生遺稿三編》、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版劉夢溪主編、馬鏡泉編校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馬一浮卷》。還參考了若干本有關馬一浮生平思想研究的專著與論文集。第三，我們整理校點的基本體例，採納了中華書局總編室於一九九一年十月組織撰寫的、發表在《書品》一九九一年第四期的《古籍校點釋例》（初稿），標點、校勘體例原則均遵其例，但因屬繁體字橫排版，故略有變通，例如在收錄的當代人著作中保留了原有的破折號——、省略號……、間隔號·等標點符號，在一些論著（如學者論文與《馬一浮先生交往錄》《馬一浮先生小傳》）中的公元紀年保留了阿拉伯數字，一些校勘記的注碼也採用了阿拉伯數字注碼。關於異體字的處理除確無異義的異體字改為通用字外，一般均保留原字。第四，《馬一浮集》原本僅少數專書標明卷次，一般均未分卷，這次校點適當作了分類、分卷，但因顧及文章、專著的體裁，本書各卷字數多少並不平衡，分卷也不盡合理，敬祈讀者鑒諒。

我們在全集編纂過程中得到浙江省原省長呂祖善、原常務副省長陳敏爾，浙江省文化廳與浙江圖書館領導的支持、多位專家的指導（如袁行霈、湯一介、毛昭晰、劉夢溪、龔鵬程）、馬一浮的親屬（如馬鏡泉、丁敬涵）和衆多熱心人士的積極參與、支持與提供資料，在此，我謹代表編委會和各冊編校人員向所

有支持和幫助過我們的先生、女士們表示由衷的謝忱！同時謹向承擔《馬一浮全集》出版任務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總編、社長和責任編輯表示我們衷心的感謝！

限於編校者的學識水準，本書編輯體例與校點疏誤定所不免，特懇祈方家、讀者不吝指正，以便重印時正謬勘誤，提高一步。

杭州聖苑寓公、力行齋主人吳光敬識於壬辰仲春

序

湯一介

一

《馬一浮全集》即將出版，該書的主編吳光教授約我寫篇序，實在不敢當，但出於對馬一浮先生的崇敬，我答應了。我必須說明，這篇“序”祇是我學習馬一浮先生著作的一篇學習心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馬一浮集》，我祇讀了第一冊，深感馬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須要好好領會，但因一直沒有機會細細研讀馬先生的著作，實為憾事。二〇〇七年《儒學天地》出版，約我寫稿，再讀《馬一浮集》第一冊，更加感到應該對馬先生的思想進行系統的研究，但因時間和學識水準關係，祇寫了一篇《論馬一浮的歷史地位與思想價值》短文，還未能真正瞭解馬先生思想的學術價值。現在，《馬一浮全集》即將出版發行，它將給我們大家提供學習和研究馬一浮先生思想的最重要的貢獻。

馬一浮先生是我國“現代儒學三聖之一”，如果說熊十力先生是哲學家，梁漱溟先生是思想家，那麼馬一浮先生可以說是經學家。“經學家”與“經學史家”不同，“經學史家”可以是學術大師，而“經學家”不僅是“學術大師”，而且是“思想理論大師”，馬一浮先生的思想是建立在“六藝之學”基礎上的一套

思想理論體系。馬先生在《泰和宜山會語·對畢業諸生演詞》中說：“國家生命所繫，實繫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則在思想。從見聞得來的是知識，由自己體究，能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成立一個體系，名為思想。”這段話說明思想體系的建立對國家命脈多麼重要。《馬一浮全集》的出版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馬一浮學術思想體系可靠的權威性文本，可謂意義重大。

二

當前，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民族復興的過程之中，民族的復興必須有民族文化復興的支撐。因此，二十世紀末在我國出現了復興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國學熱”。然而“國學”作為一種學術文化應如何定義，則是衆說紛紜。有的學者認為，“國學”即中國傳統文化，這或失之太寬，蓋凡人創造的均可屬文化；有的學者認為，“國學”即儒學，這又似失之太窄，因中國一向以儒釋道三家並稱；或謂“國學”即儒、釋、道三家之思想文化之合稱，這或並未究其源頭。我想，各種對“國學”的定義也許都有其可取之處，可並存而不相悖，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不過我認為，馬一浮先生把“國學”定義為“六藝之學”的提法應為我們研究“國學”者所重視。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1883—1969）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對這一開端的復歸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生的事情。”這段

話的意思是說，各種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民族，在它們的每次重大的歷史轉捩點時，往往要回顧（回憶）自己文化的原點，以得到“精神力量”。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並不少見，如歐洲自十四、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就是要回到古希臘；印度在爭取民族獨立時就提出要用繼承其婆羅門教的印度教為立國之本；在我國經受了幾百年的印度佛教文化的衝擊之後，宋朝的學術界提出了“出入佛老，反諸六經”。那麼，在近兩百年中華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嚴重衝擊之後，我們是不是會有一“出入西學，返諸六經”的文化復興的新時期呢？我認為，應該是肯定會有的。因此，馬一浮先生“國學者，六藝之學也”的提法應受到特別重視。馬先生說：“現在要講國學，第一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六藝者，即是《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今楷定國學者，即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泰和宜山會語·楷定國學名義》）這裏我們注意到馬先生用“楷定”說“國學名義”，而不用“確定”說“國學名義”，頗有深義。他說：“學問，天下之公，言確定則似不可移易，不許他人更立異義，近於自專。今言楷定，則仁智各見，不妨各人自立範圍，疑則一任別參，不能強人以必信也。”蓋學術文化最忌“定於一尊”，而以“百家爭鳴”為好。馬先生之學術成就，正因其有海納百川之胸懷，博通中西古今之造詣，而為世所重。馬先生提出“六藝”是“孔子之教”，蓋因孔子儒學是自覺地傳承著夏、商、周三代學術文化，而夏、商、周三代學術文化盡在六藝之中。在《泰和宜山會語·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的“六藝統

四部”一節中，馬先生把“經部”分爲“宗經論”和“釋經論”二部，此二部皆爲儒家典籍及其所傳承“六藝”之發揮。這就是說，“六藝之學”乃孔子儒學之源頭，而其後儒學皆源於此，每代在傳承中而發揮之，並在其間又吸收其他文化以營養之。馬先生不贊同“諸子出於王官之說”，但他認爲諸子中之重要的流派如儒、墨、名、法、道等實皆出於“六藝”。他認爲：“不通六藝，不名爲儒，此不待言。”此謂傳承“六藝”全體者爲儒家，所以他在《因 Chinese-Renaissance society 印書議》（《馬一浮集》第二冊雜著其他的附錄）中說：“竊謂群籍皆統於六藝。……儒者以六藝爲宗本。諸子亦原出於六藝，各得其一端。”在《復性書院簡章》中說：“書院以綜貫經術、講明義理爲教，一切學術該攝於六藝，凡諸子、史部、文學研究皆以諸經統之。”這是由於“六藝”爲中國學術文化之源頭，其後任何學說均不可能與此源頭無關，故馬先生之論點無可疑議。不僅如此，外來學術文化傳入中國，其能在中國站住腳也是因爲它和中國學術文化必可相通，所以在《馬一浮集》中多處講到儒佛相通。說：“儒佛等是間名，心性人所同具，古來達德，莫不始於知性，終於盡性。”（《濠上雜著·答吳希之》）又在《太極圖說贅言》中認爲《禮記·禮運》之“太一”、《易》之“太極”，“猶佛氏所謂一真法界”。《釋人大業大時大義大》和《釋器大道大》兩節之附語均討論儒佛可相通。當然有處也言及儒佛有同也有異，如《童蒙箴》和《希言》皆比較儒佛之同異，但仍可看到馬先生思想之一貫，認爲六藝之學在根本上可該攝佛理。蓋思想成體系則必有一貫之宗旨，必有所立高遠堅定之信念，故于馬先生《泰和會語·引端》可見其思想體系之宗旨、之信念，如謂治國學“不是零碎斷片的知識，是有體系的”，“應知道本一貫，故當見其全

體”；“信吾國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吾國先哲道理能“使全人類能相生相養而不致有爭奪相殺之事”。信念必高遠堅定，思想必成體系而一貫，此是馬先生告誡治國學之要點。

馬先生認為國學（即六藝之學）為我國最古老之學術文化之源頭，每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都有其學術文化之源頭，如長江必有發源地，其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擴大，如長江到重慶則有嘉陵江匯入，流入湖北則有漢江之流入，流入上海則有黃浦江匯入，終歸入大海。所以馬先生說：“世界無盡，衆生無盡，聖人之願力亦無有盡。人類未來之生命方長，歷史經過之時間尚短，天地之道祇是個‘至誠無息’，聖人之道祇是個‘純亦不已’，往者過，來者續，本無一息之停。此理決不會中斷，人心決定是同然。”（《泰和會語·論西來學術亦統於六藝》）蓋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遇到如何生存與發展之問題，這些問題究其根本就在於人類在遇到時如何應對，而應對之方有多種，其最合理、最實在則在人心之選擇，此實在各民族學術文化源頭已涵蘊之，此“即吾人自所具有之義理”，“義理雖為人心所具有，不致思則不得，故學原於思”，蓋因一切道理，一切德性，皆在為一心所具有，當代代開發之。因此，我們應對學術文化之源頭（六藝之學）不斷適時思考，以推進學術文化之“日新”，此乃千古不易之真理。因此，馬先生所說的“六藝該攝一切學術”是就其根源，應適時開發，日日新，又日新。所以馬一浮先生說：“六藝之道是前進的，決不是倒退的，均勿誤為開倒車；是日新的，決不是腐舊的。”

三

各民族的學術文化往往會因其所處之環境不同而在經驗層面上有所不同，故而形成其特殊表現形式。然同為人類，在其理性層面則總會有其深層之同，而其同者即是有著“普世價值”的意義。作為中國學術文化之源頭的“六藝之學”，其中必有“普世價值”意義之因素，正如作為西方學術文化之源的希臘學術文化中也有“普世價值”意義之因素。任何民族的學術文化都是在其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形成的，都是有著特殊意義的文化，而學術文化的“普世價值”往往是寓於其“特殊價值”之中。既然學術文化之“普世價值”往往寓於特殊價值之中，就此意義，正如馬先生所說：“六藝不唯統攝中土一切學術，亦可統攝現在西來一切學術。”蓋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因此，我中華民族理所當然地在自身學術文化中尋求有益於人類社會生活的“普世價值”意義的因素，這並不妨礙其他民族可由自身文化中尋求其學術文化的“普世價值”意義的因素，古云“道並行不相悖”也。故馬先生說：“道一而已，因有得失，故有同異，同者得之，異者失之。《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夫何隔礙之有？尅實言之，全部人類之心靈，其所表現者不能離乎六藝也；全部人類之生活，其所演變者不能外乎六藝也。故曰：‘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泰和會語·論西來學術亦統於六藝》）馬先生的這段話有以下三層意思：第一，就全人類社會看，雖分成多種不同的民族學術文化傳統，但所有不同傳統的文化在根本的道理上說是一致的。全人類社會應有的根本道理是什麼？

馬先生認為就是“本然之善”、“性德之真”。此“本然之善”、“性德之真”乃人性所具有，“六藝之道”就是要把此人性所具有的“本然之善”、“性德之真”開發出來，使“全人類能相生相養”的“天下大同”世界得以實現；第二，“道”（全人類社會的根本道理）對任何民族說都是“本然之善”、“性德之真”，所以是一致的，但各民族的學術文化中既有符合“道”的部分，也有不符合“道”的部分；符合“道”的可以說就掌握了全人類社會共同的根本道理，不符合“道”的則是背離了全人類社會共同的根本道理。如馬先生所說：“因其心智有明有味，故見之行事有得有失。”因此，我們考察不同民族的學術文化總可以發現其有相同的，在看到表面上有所不同之處時應注意到其深層上的相通點。馬先生說：“西方哲人所說的真、善、美，皆包含於六藝之中，《詩》、《書》是至善，《禮》、《樂》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詩》教主仁，《書》教主智，合仁與智，豈不是至善麼？《禮》是大序，《樂》是大和，合序與和，豈不是至美麼？《易》窮神知化，顯天道之常，《春秋》正名撥亂，示人道之正，合正與常，豈不是至真麼？”（《泰和會語·論西來學術亦統於六藝》）歸根結底，人類追求的就是真、善、美的理想，無論中西都是如此。古希臘的哲學家追求的是真、善、美；印度自古聖賢追求的是真、善、美；中國的“六藝”之學是古代聖賢、明君所追求的真、善、美，自不能外此。故就各民族、各國家學術文化的根本必是同歸於此，這點必須是我們應注意的；第三，為什麼可以說“六藝”可統攝現在西來一切學術？馬先生認為從根本上說“六藝”乃“人類之心靈”的體現，他說：“學者須知六藝本是吾人性分內所具的事，不是聖人旋安排出來。吾人性量本來廣大，性德本來具足，故六藝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

無道也。”(《泰和會語·論六藝統攝于一心》)其實一切道理本自在人心,祇是待你觸事而開發。朱熹說:仁者,“在天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朱子文集·仁說》第十三卷)。“天道”生生不息,以“仁”爲心,“天”有使萬物良好地生長發育的功能,故“人道”也應效法“天”要愛護一切,這是因爲“天人一體”,“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程氏遺書》)。蓋“人”得“天之精髓”而爲“人”,故人生當在實現“天”之“塊然生物之心”,而有“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天心人心實爲一心。人生之意義就在體證“天道”,人生之價值就在成就“天命”。故馬先生說:“六藝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無道也。從來說性德者,舉一全該則曰仁,開而爲二則爲仁知(智)、爲仁義;開而爲三則知(智)、仁、勇;開而爲四則爲仁、義、禮、知(智);開而爲五則加信而爲五常;開而爲六則並知(智)、仁、聖、義、中、和而爲六德,就其真實無妄言之,則曰‘至誠’;就其理之至極言之,則曰‘至善’。”(《泰和會語·論六藝統攝于一心》)這一段話可以說是馬一浮先生對“六藝”根本思想之系統的闡述,亦即是他思想所追求真、善、美體系的集中說明,蓋一切學術文化不外是追求真、善、美的。我國學術源頭之“六藝”實是夏、商、周三代之結晶,是我國民衆的生活經驗之積累,經過三代諸聖賢明君的提煉而形成理論體系,馬先生把此體系清楚明白地概括出令人易於理解的體系,實是一大功德。雖然我國的“六藝”之道從其基本精神上說可以統攝西來學術,但同樣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民族的學說亦可有統攝其他民族學術文化的功能,如印度學術文化傳統、西方學術文化傳統、古波斯學術文化傳統等等,我們對他們的學術文化傳統也要同樣的尊重。爲此,馬先生特別要我們注

意：“今日欲弘六藝之道，並不是狹義的保存國粹，單獨地發揮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泰和會語·論西來學術亦統於六藝》）處在今日全球化時代，學術文化發展的多元化趨勢已不可逆轉，因此在傳承我國故有學術文化的同時，必須尊重其他民族的學術文化，必須善於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之優長，這樣我們才可以和其他各民族、各國家共同創造人類所理想的“天下大同”世界。

四

馬先生把“國學”楷定為“六藝之學”，特別說明“六藝之學”不僅是我國人文學科文、史、哲的源頭，也是我國社會學科政治、經濟、法律之源頭，並且還是我國自然科學的源頭，這是頗有深義的。蓋如果用今日學科的分類來做框架，是不能把“六藝”限制在某一分科之內的，我們能說“易學”祇是哲學嗎？我們能說《詩》祇是文學嗎？我們能說《春秋》祇是史學嗎？是不能這樣說的。例如《易》，如用分科來說，它既是哲學，又是政治學，也是經濟學，甚至也可以說它是中國自然學科之源頭。《詩》當然是一種文學，但它包含著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諸多學科所涉及的深刻思想內涵。其他，如《書》、三《禮》、《春秋》三傳皆是如此。因此，我們研究“六藝”的《易》、《書》、《詩》、《禮》、《樂》、《春秋》是不能用現在的學科分類做框架的。其實今日之學術文化發展之趨勢，越來越向跨文化跨學科方向發展。就跨文化方面看，正如前面馬先生所說，中西學術文化從根本上說都是對真、善、美的研究，那麼我們在研究中國學術文化時必須關照西方文化。如果就跨學科方面看，“六